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重要論文和講話專輯)

第四輯



四川人民出版社

10
1
E16

254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

(重要論文和講話專輯)

(第 四 輯)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款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開本787×1092 $\frac{1}{32}$ 88頁·5 $\frac{1}{2}$ 印張·136,000字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98 定价: (5)3角6分

統一書号: 3718·24

目 錄

在干部政策問題上駁斥右派……	安子文(1)
从“联合政府”駁斥儲安平……	常芝青(10)
天下究竟应属于誰? ……………理 光	林岐瑞(26)
* * *	
保衛我們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	张志讓(34)
粉碎法学界右派分子的复辟企圖……………	韓幽桐(41)
* * *	
文藝家必須和工農羣众結合徹底改造思想……………	陸定一(46)
努力把自己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工人……………	郭沫若(54)
接受教訓，增強党性……………	安子文(62)
关于知識分子的兩面性及其改造問題……………	鄧初民(69)
* * *	
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須進一步深入……………	郭沫若(77)
我們对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态度……………	于光远(86)
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社会学……………	孙定國(94)
粉碎“恢复”資產階級經濟学的政治陰謀……………	張友仁(108)
右派在歷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翦伯贊(121)
* * *	
論民主自由……………	廖盖隆(128)
何物自由主义……………	楊东尊(135)
* * *	
从“不滿”說起……………	胡 繩(146)
关于人性……………	章 人(153)
* * *	
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	孙定國(163)

在干部政策問題上駁斥右派

安子文

現在在我們的國家內正在進行着一次全民性的大辯論，這場辯論的結果將決定我們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黨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是否正確的問題，就是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正在激烈地進行辯論的問題之一。我們大家都知道，正確地挑選和使用干部，是保證黨的政治路線實現的一項具有決定意義的工作。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說：“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一切計劃、決議、命令、指示等等，都屬於‘出主意’一類。使這一切主意見之實行，必須團結干部，推動他們去做，屬於‘用干部’一類。”在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段話中，扼要而又深刻地說明了干部問題的重要性。我們不難理解，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以要選擇干部問題作為向党進攻的一個重點，這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對黨的干部政策進行惡毒攻擊的目的，也絕不是只限於反對這個政策本身，而是想通過這一方面的進攻，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對於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干部政策問題上所發表的謬論，必須嚴肅地加以駁斥。

我們黨一貫是主張根據“德才兼備”的標準來挑選干部的。就是說，在挑選干部時，不只是一要看“才”，而且必須要看“德”；不只是一要看業務能力，而且必須要看政治品質。右派分子的主張和我們恰好相反，在他們看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干部政策問題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犯錯誤的原因就在於重視了干部的

“德”，重視了干部的政治情况。右派分子对党的干部政策的污蔑和攻击，主要是圍繞着这样一个中心内容而發的。他們說共產党用人是“德乱才廢”，是“重德輕才”，是“用人唯資”，是“宗派主义”，說共產党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已經过时了，現在是建設时期，用人不該再強調政治条件了。他們的这些說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是在挑选干部的时候，不應該考慮干部的政治情况，而只應該根据干部的“才能”來“量才使用”。顯然，这种言論是非常荒謬的。

为了反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謬論，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在对“德”和“才”的看法上，我們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什么是“德”呢？从哪些方面來考察一个干部的“德”呢？“德”就是干部的政治品質。判断一个干部的“德”是怎样的，就要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的立場上，是不是忠实于社会主义事業，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事業服务。当然，要做这样的判断，不只是根据一个人在口头上是怎样講的，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場上來观察問題，处理問題。并且不只要看他現在的言論和行动，而且要了解他的歷史情况，有歷史問題的必須審查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个干部的“德”有全面的了解。

有些右派分子反对根据“德”挑选干部的理由”，是“德無定說”。他們故意把“德”說成是沒有客觀标准的，他們說，“德”的优劣，不过是領導者的主观看法而已。希望借此來散播用人應該不問政治的反动主張。这种別有用心之說法本來是不难識破的，可是对一些政治上幼稚的人却發生了影响。这些人也跟着右派分子叫喊，說“德”太抽象了，不具体，不好掌握，因此，不應該以此作为挑选干部的准标。我們姑且不必多談道理，只要說一說眼前的事实就够了。在“大鳴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有的人坚决地站在右派的立場上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有的人坚决地维护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坚决地向右派反击，也有的人开始动摇于兩者之間，以后才逐漸地認識了右派的反动面貌。这种狀況，能够說是偶然的嗎？能够說，人們这种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不是非常具体、非常鮮明的嗎？难道能够說，这不是由每个人的立場所决定的，而是由領導者的主觀看法所决定的嗎？其实在我們的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政治立場、政治态度，总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具体表現出來，問題只是有些人看不到或者故意裝做沒有看到而已。

什么是“才”呢？从哪些方面來看一个干部的“才”呢？一个干部的“才”就是他的業務能力，就是使他适合于担負某种工作的知識和經驗，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要了解一个干部的“才”，最重要的是看他实际工作的結果，是不是完滿地完成了党和國家所交給他的任务，而不是憑主觀印象，离开实际工作看一个人是不是聪明，是不是有“才華”，这里还必须強調一点，就是不应该抛开一个人的“德”去孤立地看他的“才”。也就是說，不应该抛开一个人的政治立場，去孤立地看他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那么，他的“才能”越大，对人民事業的危害也就越大。因为他的“才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能，而是反对人民的“才能”。在这一大反右派斗争中，象这样的例子，應該說是很不少了。

右派分子对“才”的看法和我們是有根本不同的。他們把“才”看成为一种与一个人的政治立場毫無关系的东西，看成为一个人天生的聪明和才智。因此，他們主張“不拘一格用人才”，也就是說，只要是聪明的，有“才華”的人，不管政治情况如何，都应该一律加以重用。按照他們的邏輯，那怕是地主、惡霸、殺人凶犯、美蔣特务，只要有“才”，就都应该委以重

任。否則就是氣量狹小，不如封建社會的“創業開國之君”。有的右派分子為了進一步說明自己的主張，還提出了“才”就是“德”，“有才就有德”的說法。這種說法的用意是不難理解的。他們是站在剝削階級的動搖立場上看問題的。在他們看來，廣大的勞動人民是愚昧無知的，是天生應該被“治于人”的“勞力者”，因此也就是無“才”無“德”的；而他們自己則是天生的優秀人物，是應該“治人”的“勞心者”，因此不僅有“才”，而且有“德”。他們所說的“才”，就是反人民的“才”，他們所說的“德”，就是他們自己的動搖的階級立場。他們說“才就是德”，“有才就有德”的目的，一方面是拒絕我們所要求的階級立場，另一方面是堅持他們自己動搖的階級立場。從這裡可以看出，最反對談階級立場、階級觀點的右派分子，其實正是有他們自己明確的階級立場和階級觀點的，只是他們故意把它隱藏起來罷了。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才”的問題的動搖看法，在那些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中間得到了共鳴，這是很自然的。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他們總是不能夠了解工人、農民在歷史上的作用，總是過於看重自己，把自己的作用估計得過高。當他們看到有一些工農出身的幹部，或者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人，居于比自己更高的崗位上，甚至是直接領導自己的，心中就憤憤不平了。覺得自己是“懷才不遇”，認為自己是沒有遇到伯樂的“千里駒”。他們所以感到自己有“才”，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認為自己進過大學，拿過大學的畢業文憑，就不該再“屈居人下”。在他們的思想中還沒有去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毒素。而右派分子也就利用這一點，對他們進行煽惑、點火。有不少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部分沒有經過改造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一個時期內受了右派分子的欺騙，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應該指出，文化、科學、知識，這是非常寶貴的東西。我們的國家所以還落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為文化、科學還不够發達。因此，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產。我們有些老干部，特別是有些工農出身的干部，所缺乏的也正是這一方面的東西，他們必須下定決心，堅持不懈地努力學習，準備經過若干年的苦學，把自己文化不足的情況完全改變過來。但是，同時必須指出，科學、技術、知識之所以寶貴，就在於它能夠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的事業服務。一個人的文化程度的高低並不是唯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這個人的思想是不是真正經過改造，是不是真正站穩了工人階級的立場，是不是真正忠實於社會主義的事業。如果一個人雖然有知識，但是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那麼，他的知識就不能發揮作用，或者不能全部發揮作用。這不是別人許不許他發揮作用的問題，而是他自己的錯誤的立場和思想限制了自己。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很多青年知識分子干部引起警惕的。

右派分子還有一種說法：共產黨的干部政策已經過時了，過去在革命時期重視“德”是對的，那時候有沒有“才”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可是現在到了建設時期，就不應該再繼續重視“德”了，現在只有“才”是最重要的了。這種說法的反動性也是很明顯的。按照這種說法，革命是很容易的事情，革命時期的干部並不需要有“才”。可是試想，如果當時的軍事指揮員沒有指揮作戰之“才”，農村工作者沒有發動、組織農民之“才”，那麼，革命戰爭怎麼會取得勝利呢？農村革命根據地又怎麼會得到鞏固呢？按照這種說法，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則只要有“才”就夠了。可是試想，如果用一個聰明的、有文化的但是對社會主義事業漠不關心，甚至是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去當工廠廠長，這個工廠如何能建設好呢？

由此可見，革命時期也好，建設時期也好，挑選干部的标准都只能是“德才兼備”，想丟掉任何一方面，都是錯誤的。這樣

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對幹部的要求是不是和過去完全一樣呢？不是的。在新的歷史時期，黨對幹部的要求，從“德”、“才”兩方面來說，都比過去更加提高了。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所要求的幹部的“德”，主要是能夠站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立場；而今天就必須要求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為社會主義服務了。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的任務比較單純，今天的任務比過去要複雜得多、艱巨得多。因此，對幹部的“才”的要求，也就要比過去提高得多了：不但是要求他們具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而且要求他們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不但是要求他們具有一般的組織領導能力，而且要求他們具有從事某種專門業務的知識。

還有些右派分子說：共產黨用人只重資歷，以“資”代替了“德”、“才”，是“用人唯資”。這種說法，好像並不是反對黨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相反地，倒是批評一種不合乎這個政策的現象。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確實可以找到某些在挑選幹部時只着重資歷的事例，就正如同可以找到某些只着重了“才”而忽視了“德”，或者只着重了“德”而忽視了“才”的事例一樣。這應該說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但是如果把這種現象說成是由于我們黨的幹部政策而產生的，那就只能說是一種惡意的攻擊。劉少奇同志早在1945年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就曾經批評過這種現象，指出在選拔幹部時，首先地並且是唯一地估計他的黨齡的長短與資格的高低，是不正確的。全國解放以後的幾年來，黨更是一再地強調指出，不應該把“資格”當作挑選幹部的標準。事實上，最近幾年來，這種現象已經大大減少了。那麼，右派分子為什麼要抓住這樣一個題目大做文章呢？把事情說穿了是很簡單的，他們的目的實際上還是反對“德”，所謂反對“資”只不過是一種

借口而已。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中，在提出反对所謂“用人唯資”的同时，對我們久經鍛煉的老幹部曾經進行了何等的污蔑。他們污蔑我們的老幹部是“老油条”，是“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馭眾”，是压在青年幹部头上的“石頭”，說我們的老幹部大部分是不稱職的，只是靠老資格吃飯。甚至提出要把老幹部“拿開”，要把他們當作“石頭”搬走。右派分子對我們的老幹部為什麼有這樣大的仇恨，他們對我們的老幹部這樣地大張撻伐，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現在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他們所以要用那樣大的力量來反对老幹部，無非是因為他們知道老幹部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最重要的骨幹，如果他們真能夠把老幹部趕下台去，就可以由他們出來“收拾殘局”了。當然，右派分子的這種想法永遠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黨雖然從來沒有把資格當作挑選幹部的標準，但這絕不是說，我們不重視幹部的革命鬥爭歷史。一般地說，鬥爭歷史長的人，所經受的鍛煉和考驗較多，立見就更堅定，經驗也更豐富。但是，現在有些青年知識分子幹部，既沒有經過鬥爭鍛煉，又沒有取得生產知識，只是因為自己的文化程度比較高一點，就自高自大，看不起老幹部。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有些青年幹部就因為存在着這樣的錯誤思想，所以在一個時期內變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虜。這個教訓是值得每一個青年幹部，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幹部深切記取的。

右派分子在攻擊黨的幹部政策時，還說我們的國家機關是“清一色”，“每一個大小單位都要安一個共產黨員作頭兒”；說我們黨用人只問“黨不黨，困不困”，不問“賢不賢，能不能”。他們的這些說法總起來是一個意思：共產黨的幹部政策是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

在我們的幹部工作、人事工作中，是不是曾經有過一些帶有

宗派主义傾向的缺點和錯誤呢？應該說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是有過的。這也正是我們黨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所要着重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絕不能允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這樣一些缺點和錯誤來歪曲和污蔑黨的幹部政策。對於這種污蔑，我們只要舉出一些簡單的事實，就完全可以把他們駁倒。

根據去年年底的統計，現在在我們全國的區以上的幹部中，黨員幹部不到三分之一，非黨幹部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即使把團員除外，不是黨、團員的幹部也還在45%以上。試想，這種情況怎麼能夠叫做“清一色”呢？在領導幹部中黨員的比例要比較大一些，但也絕不是象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樣。比如，在國務院所屬各部、委的272個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中，黨員幹部有226人，占83.1%，非黨幹部有46人，占16.9%。如果只說部長（主任），則非黨幹部的比例還要大一些，在46個部長（主任）中，有16個部長是黨外人士，占34.8%。在省長、副省長，自治區主席、副主席，三個中央直轄市的市長、副市長192人中，黨員幹部有130人，占67.7%，非黨幹部有62人，占32.3%。這又怎麼能夠叫做“清一色”呢？

在“大鳴大放”中右派分子到處叫喊，說我們提拔幹部不公平，只有黨員幹部才能夠得到提拔。事情是不是真的象右派分子所講的那樣呢？讓我們看一看工業、財政貿易、文教這三個系統去年提拔幹部的情況，就可以了解事實究竟是怎樣的了。在這三個系統去年提拔了職務的全部幹部中，非黨幹部所占的比例是：工業29%；財貿39%；文教42%。如果除去團員，非黨、團員的幹部所占比例是：工業20%；財貿19%；文教26%。試問，這怎麼能說，只有共產黨員才能夠得到提拔呢？

或者有人會說，雖然非黨幹部在各級領導幹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總起來看，在領導幹部中還是黨員幹部占多數，這是不是也是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呢？這樣提問題的人，實際上是把

黨的領導和宗派主義混為一談了。既然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那麼，在它的國家政權機關的組成成分上，也就不能不表現出這個特點來。我們都知道，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是經過它的先鋒隊共產黨來實現的，因此，共產黨員在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中占多數，這是很自然的。如果把這種狀況說成是“宗派主義”而加以反對，那就是無異於說應該取消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了。

周恩來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從來都是反對宗派主義的，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共產黨都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又主動地提出了願意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而它的最終目的又是要實現消滅一切階級、从而使一切政黨，包括共產黨在內，都趨於消亡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黨同宗派主義是絕不相容的。共產黨總是教育黨員要時時刻刻注意加強黨和羣眾的聯繫，絕不容許黨員用宗派主義的態度來對待黨外人士。中國人民大眾之所以信任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因為他們根據事實看清楚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工人階級政黨。”事情是如此的清楚，右派分子妄圖污蔑黨的幹部政策，挑撥黨與非黨羣眾的關係，又會有什麼結果呢！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难看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說我們黨的幹部政策是“重德輕才”，是“德亂才廢”，是“用人唯資”，是“宗派主義”，這些都不過是說明他們想用一切辦法來取消挑選幹部的政治標準而已。為什麼右派分子對於挑選幹部的政治標準有這樣大的反感，要集中火力來反對這一點呢？首先這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政治情況是經不起考察的，所以他們就拚命地來反對這個政策。但這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右

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事業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仇恨。他們企圖通过对于干部政策的進攻，來取消党的領導，來破坏社会主义事業和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我們都知道，干部是我們國家政权的骨干，是我們正在建設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大小支柱，党的路綫和政策是要通过廣大的党与非党的干部來貫徹實現的。因此，如果我們放棄了選擇干部的政治标准，不是依靠那些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業忠心耿耿的人，而是去依靠那些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業仇恨、不滿、心怀異志的人，那就等于把我們經歷千辛万苦，用無數生命作代价所爭取到的政权拱手送給敌人。这正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盼望的。他們反对党的干部政策的最終目的，就在这里。

讓我們重复地說一下，挑選使用干部的問題，絕不是一个小問題，而是关系我們社会主义事業的成敗，关系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关系我們國家政权性質的大問題。右派分子妄圖修改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那只能是枉費心机。工人階級和它的政党，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則問題上是不会有任伺动搖的。

(原載1957年9月20日中國青年報)

从“联合政府”駁斥儲安平

常 誌 青

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論，在受到全國有覺悟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以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憤怒反击后，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行將結束之際，儲安平以代表身分發言，終于不能不供認他的謬論是对党的惡意誹謗：他的一切錯誤言行，是为章罗聯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而服务。他在那个莊嚴的講壇上宣称，决心“向人民投降”，要“繼續深入檢查自己的思想根源”“繼續深入批判自己的錯誤言論。”可是，一个月已

經過去了，還沒有看到和聽到他的什麼“深入檢查”和“深入批判”。在8月3日首都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他的交代仍然是避重就輕，吞吞吐吐，避免直接談到章羅聯盟的反黨政治陰謀。由此可見，儲安平究竟是要老老實實地向人民繳械投降呢？還是要敷衍搪塞，決心自絕於人民呢？——這，仍然是一個懸案。這個答案或結論，現在還是可以等待儲安平自己去做的吧。

儲安平為什麼要向党進行那樣惡意的誹謗呢？他攻擊黨的企圖何在呢？關於這個問題，他始終沒有做過正面的、直接了當的回答。不過，經過人們的一再駁斥和嚴正的批判，問題已經是昭然若揭了。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真正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沒有了社會主義。換句話說，擺脫黨的領導，就是要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半途而廢，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因此，關於儲安平這些右派分子的險惡企圖，人們是看得很清楚了。

使資本主義復辟，那就是使國內外反動派重新統治我國整個大陸，那就是意味着使我們祖國再倒向美帝國主義集團的懷抱，使我國再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慘境地。關於這一層，人們是不是都已弄明白了呢？是的，大多數人是早已明白了。可是也還有一些人，特別是那些在靈魂深處還藏有資本主義王國的人，好像還沒有很好考慮到這一着，還把我們同右派的鬥爭看做是“未免小題大作”，或者對於右派分子的某些謬論，在思想感情上還有些糾纏不清。就是因為有這末一些空氣稀薄的空間，右派分子覺得他們還有作為的余地，他們還說要在“黨天下”謬論中吸取什麼“合理的內核”，右派“理論家”陳新桂還說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是挖了共產黨的“老根”，恬不知恥地造謠說“共產黨恨儲安平，是因為儲安平提到聯合政府，這是共產黨最害怕的。”

由此可見，在黨的領導問題上，我們同右派分子的這一場爭論，是有如何嚴重的意義。而這一場爭論還沒有也還不能夠就此結束。關於這一爭論的實質，乃是从政治上，思想上解決資本主

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勝負的大問題。关于如何巩固党的領導地位，如何充分發揮党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領導作用和核心作用，即如何加强这种領導力量和核心力量，还必須在理論上，实际上，在人們的思想上一进一步明确起來。关于对儲安平の“党天下”这一株毒草的清除、消毒工作，还需要繼續進行。

他說的究竟是什么階級內容的联合政府

陈新桂說儲安平提到联合政府，这是共产党最害怕的。这話本來純系捏造，是造謠中伤，实在不值得一駁。不过倒要問問陈新桂之流，究竟是誰怕联合政府？更确切的說，究竟是誰曾最恨組織联合政府的倡議和主張？儲安平在他的“党天下”謬論中，也好像他在解放以前，就是拥护“毛主席倡議同党外人士組織联合政府”的主張的（真的是这样嗎？我們在后面要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是故意把共产党描画成一个毫無原則的、言行不一的党。同一切反动派一样，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特別是那些頭面人物和骨干分子，为了欺騙、迷惑一些年青幼稚的人，有时裝做歷史家的样子，來評人論事，实际上他們是幻想阻擋歷史的發展，对于歷史的变化和發展情况，不願意或不敢正視，他們真是好比傳說中的申公豹，眼睛、鼻子、嘴都是朝后長的，他們总是向后看，总是望着过去，不僅看不到將來，也看不見現在。三年的解放战争，打垮了拒絕接受組織民主联合政府要求、坚持国民党一党專政（实际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团的專政或蔣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專政）的反革命政权。在人民推翻了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之后，毛主席于1949年7月1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并在同年9月公布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这个共同綱領曾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到1954年9月10日第一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莊嚴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如憲法序言中所指出的，這個憲法是以共同綱領為基礎，又是共同綱領的發展。在我們的憲法上規定了我們國家的根本性質和基本制度。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我們國家里，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在這些機關和其他國家機關里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國家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上層建築，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國家制度，我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後，很快地也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經使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基本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對於這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重大變化、大發展，儲安平之流好像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對於日益鞏固和健全的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反而認為是退步了。他故意不用對我國政府這個中外人士所慣稱的“人民政府”，而盜用解放以前黨曾力爭實現的這個“聯合政府”的口號，來攻擊黨，誹謗我國人民最敬愛的領袖，妄圖從根本上動搖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據儲安平看來，1949年開國以後的中央人民政府“也還象個聯合政府的样子”至於現在那就太不象樣了。

其實，問題不在於叫“人民政府”或叫“聯合政府”。儲安平關於聯合政府問題是站在形式的觀點上。正如列寧所說：“形式的民主觀點，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觀點，資產階級不承認無產階級底利益與無產階級鬥爭底利益是高於其他利益的。”聯合政府的民主形式是一回事，這個政府底階級內容是另一回事。按照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右派看來，問題應當明白地這樣擺出來，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聯合政府，即人民民主專政或革命的聯合政府，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聯合政府，即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專政或反革命專政的聯合政府。

儲安平之流，既然是以歷史家的姿態提出問題的，那我們也不妨回到過去，回到共產黨倡議組織聯合政府的歷史。這對於揭穿右派分子的寡廉鮮恥、自私自利、卑鄙醜陋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很有用處；對於增強我們年青一代的抗毒力量也有益處。

原本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上的一場原則爭論

中國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是遠在抗日戰爭接近勝利之前提出來的。中國應否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問題，曾是十多年前國共兩黨間的一場很重要的爭論，那曾是關係着幾萬萬人民生死問題的原則爭論。毛澤東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1945年4月24日）的政治報告，就是以“論聯合政府”為題的。在這個著名的報告中，毛澤東同志把這樣一個國家制度列入黨的最低綱領中，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黨的奮鬥目標，並號召共產黨人為此目標要不惜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他說：“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並且把“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作為當時的具體綱領，並且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實現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鬥”。可是堅持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反動派卻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于民”，却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這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